

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意义的探析

文 / 华梅

中国正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即 25 部史书中,有 10 部设有专门章节《舆服志》,这是研究中华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正统依据,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其中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治国思想,同时更可以古为今用,使我们能够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实力立于世界之林。因为中国曾是礼仪之邦,《舆服志》总结记录的正是几个重要朝代的服饰制度,包括车马仪仗规定。对此,中国服装界乃至社科界多为片断引用,未进行系统研究,有专家专门研究“舆”,即车,有的专家专门研究“服”,却未正式分析《舆服志》。

2008 年,笔者主持的“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成功获批,于是这一艰苦的学术历程开始了,同时收获的便是愉悦。笔者带着数位年轻教师先是攻

克难懂的古文,再便是查询相关历史资料。2010 年底,67 万字书稿上交结项,评审用了近一年时间,2011 年底正式结题。2012 年初,商务印书馆约笔者出版,我们定好成书要 40 万字,120 幅图。笔者又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系统规范地修改了七八遍,再配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书中线描图,2013 年 5 月上交商务印书馆。鉴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商务印书馆拟以精装形式推出(图 1)。

这一研究起始时间,应是 1996 年,当年人民出版社约笔者撰写《服饰与中国文化》一书,笔者在书中提出一些观点,针对《舆服志》也用了一些篇幅。当然,在 40 万文字的书中,写了约两万字,显然不够深入,可是的确起了个好头儿,致使笔者后来有勇气,有信心,也有兴趣去研究这个课题。通过研究《舆服志》,笔者收获甚多,将此归为七点,以与同道相互切磋。

1 一代舆服皆为制

《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段问答:“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研究中国历代史书中的《舆服志》,首先就会联想到这段话,尤其是“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因为贯穿《舆服志》并体现其宗旨的,实际上就是在治理国家时,应遵循哪样的传统,建立怎样的制度,而且如何重视这确立主题思想的外显形象,即车旗服御。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必须考虑到国家大型礼仪时的车马



图 1:《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封面装帧效果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2BG063);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4ZD25)

作者简介:华梅,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仪仗(图2~图4)和衣服佩饰,这是隶属政治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始终被作为正统的思想体系。尽管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墨家以及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都对中国人产生过影响,但最为根深蒂固的还是儒家思想。汉代及以前成书的《周礼》、《仪礼》、《礼记》已经充分总结并弘扬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史书《舆服志》的基础和主线。



图2: 皇帝大驾卤簿宝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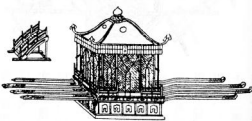


图3: 皇帝大驾卤簿金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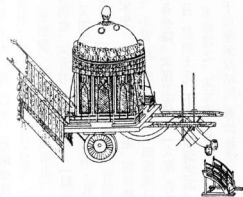


图4: 皇帝大驾卤簿金辂

孔子认为商代的车马仪仗规格、周代的礼服颜色、款式是最正统的,换言之是最有利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孔子最念念不忘的“克己复礼”即恢复周礼。周代是中国奴隶制最为完备的时期,很多制度包括冕服在内的服装制度都是在那时建立的。因此,孔子在这段话中强调的是用夏代的历法,坐商代的车子,穿周代的礼服,奏舜时和周武王时的音乐。这是一种定调的理论,这种舆服规范从《后汉书》开始被详细记录下来,并开宗明义地讲清为什么要在史书中专设一项《舆服志》。

目前可见到,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最早的《舆服志》是《后汉书·舆服志》,系统记载了汉代车旗、章服、冠履的有关规章制度及具体款式等,此后《晋书》、《南齐书》、《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都设有《舆服志》,《新唐书》设《车服志》,与此类同,只是改用一个字。也就是说,中国正史中,有10个朝代的车旗服御制度是非常完整、非常成熟的,而且还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舆,原指车箱,后引申为车,《老子》中提到:“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即是以船与车并提的例子。服,即为衣冠。《书·皋陶谟》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绣绘日、月、星辰等“图案”的礼服常被称为“章服”,因为古文中将纹样也称为“文章”。这样,“舆服”一词实际上成了车乘、章服、冠履以及仪仗所用旌旗和车队装饰的总称。翻开中国历代史书中的《舆服志》章节,我们不难看到,《舆服志》不但记载着具有国家礼仪意义的车旗与衣服的形态及其带有明显文化意味或纯装饰性的花纹,而且还记载着这些形态与花纹如何与使用者的社会等级相对应,并指出在何种礼仪或环境下使用。历代《舆服志》是二十五史(或说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中的重要章节,可作为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服饰艺术和舟车制造技术的重要依据。

2 “隔代修史”与《舆服志》

在先后对《舆服志》文本以及《舆服志》文本所代表的制度进行研究之后,研究成果必然充分肯定了历代《舆服志》。作为一个具有庞大系统所存在的复杂性和继承性,系统本身必然存在偏差。《舆服志》中的偏差有些是可直接辨识的,比如说现有历代《舆服志》文本并不都是为了记述舆服制度而存在,其中存在大量评论性内容;还有很多偏差不能直接辨识,需要结合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分析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比如说现有历代《舆服志》文本并没有完全记载当朝的舆服制度,这一现象固然可以用篇幅有限来解释,但编撰者的选择标准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这种存在于历代《舆服志》文本中可直接辨识的以及不能直接辨识的系统偏差的根源,产生于历代《舆服志》的编撰方式本身。中国政治制度中存在具有高度职业责任感的史官,他们忠实记载朝代历史事件、政治制度以及重要人物,因此留下较为客观并丰富的原始资料。而中国史书的编撰又是以“隔代修史”为传统

的,如《晋书》为唐代房玄龄等所编修,《新唐书》由宋代欧阳修等撰编。这就是说,“二十五史”中的历代《舆服志》尽管是历史的记录,以对历代车旗服御制度的确立、构思、设计的总体为主要内容,但立论与归纳又带有后一代人的审视与评估。出于对历代《舆服志》编修者的身份、学识、职业操守的信任,以及通过与其他文献资料的对照,目前可以肯定这些记录和评估多半是科学公正的,但也不可避免受到编撰者自身民族身份认同感和时代意识的影响。

编撰者加入的评论和编撰者遵循一定标准而没有采用的原始资料,都是由《舆服志》编撰方式所产生的系统偏差所致,它们使现存的《舆服志》文本和《舆服志》文本所代表的制度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偏差是可控的,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了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如《后汉书·舆服志》作为在正史中首次设置的篇章,其实还有一些复杂的组合过程。《后汉书》是南朝宋时的历史学家范曄编撰的,书中记述并归总了东汉196年的史实。到了北宋时期,有人将晋代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与之合刊,于是成了今天的《后汉书》。其中的《舆服志》即是司马彪所创,同时还有《百官志》。在北宋之前,已有《晋书》、《南齐书》、《旧唐书》出现了《舆服志》,唐人房玄龄、梁人萧子显、后晋人刘昫是不是曾受到司马彪史书建制体系的影响了呢?无论怎样说,隔代修史,在《舆服志》的开创与设置中,司马彪都是功不可没的。

3 《舆服志》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态势

任何国家或任何中国朝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构成了宝塔形,即占最大多数的人民,居于底部,从官吏到最高统治者则居于“宝塔”的中部乃至顶尖。在封建社会中,顶尖者就是皇帝。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向来是:“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连皇帝赐给下官的服装竟也光彩无限:“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葱珩。”人类的服饰,由自为自在,而进入规范化,规范化

也就是礼制化的过程。

中国史书中的《舆服志》,主要需体现礼制思想。因此,最堂皇富丽的服饰,被规定只能由最高统治者——皇帝穿着。即使着装趋向崇尚丰俭,皇帝的冕服,仍然使用最名贵的珠玉、黄金,以至珍禽异兽的羽毛、皮革来制作。所以中国史书的《舆服志》,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仪仗服饰史卷,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特色。

当然,服饰毕竟是具有实用功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统治阶层的服饰向外向下扩散,使普通人也从中学习或模仿某些服饰的风范,如帝王佩玉,君子佩玉,民众也佩玉。权贵之家总是在服饰上努力寻求“内样”(如“宫装”)。到了晚清,“军机绿”、“军机紫”也成了人民普遍喜爱的服色。由于统治阶层穷奢极侈,不惜人力物力,所以也就在实际上带动并推动了中国服饰文化向前发展。应该说,在中国服饰文化中,历代《舆服志》所记录的观念总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以《后汉书·舆服志》中的武冠为例,书中说:“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珣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这里说的是一种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帽子,文中引注也提到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额。但是,后来为汉族人用时,已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如帽上的金珣、蝉饰、貂尾等。文中引汉应劭语:“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洁,口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又说:“蝉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润而毛彩不彰灼。”汉代时,侍中、中常侍戴的帽子就是加金珣,即冠前的金牌饰;再附蝉形饰,多以金、银箔镂空为蝉形,加插于冠额正中,取义为高洁、清虚;并将貂尾插在冠上。因为这种冠从汉代起始主要用于宦官近臣,所以必加金珣(珣,以后成了宦官的别号)。插貂尾则成了示恩宠、形显贵的一种特殊着装方式了。

《舆服志》中还留下对着装者性别角色规

范的记载,如《晋书·舆服志》中写道:“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从之。”魏明帝是曹叡,魏明帝好妇人之饰,在当年是无独有偶的。如《晋书·五行志》记魏国尚书何晏也“好服妇人之服”。傅玄评论他说:“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服妖既作,身随之亡。”这直接批评了男性穿女性服装的着装行为,认为这样着装颠倒了天地的秩序,违背了国家的规制。实属大逆不道、妖异不祥的。《舆服志》中未对魏明帝过多指责,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一国之主,不便直接抨击罢了。

4 《舆服志》所记载的祭天祀地

历代《舆服志》中蕴含的第一重文化内涵就是统治者首先重视祭天祀地(图5),这里清楚地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众所周知,人从原始社会阶段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感受着自然界的美好与恶劣、恩赐与惩罚。人们不知大自然如何形成,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头上的天和脚下的地。老天和善的时候,给人类以和煦的阳光和适时的风雨,而老天发怒时则会久久阴郁甚或暴雨倾盆,冲毁了人类的房屋。大地也是这样,它可以给人类提供各种果子、动物或收获各种粮食,但也可以无情地让耕种者颗粒无收甚至于地动山摇……

中国人早期的文字形式中,多处涉及天,如《书·泰誓上》写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诗·邶风·北门》中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这里实际上是把天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

实体,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机构,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同时,又是一位可以护佑人类的神灵。在《易·系辞上》中写“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们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天的帮助就会顺利。对于大地的认识也是这样,《管子·形势》中即直言:“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中国原始社会陶器中,有一种裸体孕妇形象,如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就有这样的陶俑,考古界称其为“农业之神”、“生育之神”或“大地之母”认为这是人化了的大地。

由于大自然的神秘不可测,中国古人对大自然始终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周礼·天官·大府》中记述:“邦都之赋,以待祭祀”。这就是以一种特有的仪式,包括供品、祭祀人衣装及整体程序来显示人类希望得到大自然护佑的虔诚之心,人们取悦于天地,以期冀平安与衣食常足。《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写道:“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佑王建国。”祭天祀地就要有各种专用礼器,如玉器,这一段文字后有关于玉质礼器的讲究,“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除了礼器之外,当然就是祭祀者的服饰以及祭祀队伍的车马旗帜。《周礼·春官·典瑞》中写道:“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至于等级,周礼中规定: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也就是说祭天祀地的时候,不同等级的人要穿符合自己身份的衣服,以表示严肃。由此确定“司服”一职,专来负责君王在礼仪中穿用的衣服,原文为:“掌王之吉凶衣服”。同时,有“巾车”一职,“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有“典路”一职,“路”即“辂”,指车。具有“掌王及后之五路(图6,见下页),辨其名物与其用说。”有“车仆”一职,“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革车之萃、轻车之萃。”;有“司常”一职,“掌九旗之



图5:祭社稷礼服希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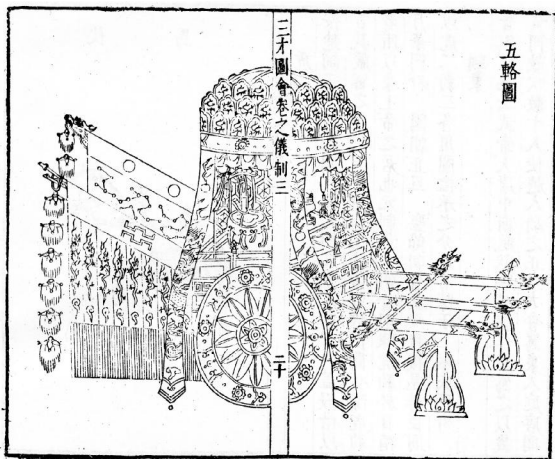


图6: 五辂

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这些官员,其职责分得相当细,仅就祭天祀地一点就要因人因时不同,有多种衣服和车旗规定。

5 《舆服志》所体现的拜陵谒庙

纵览世界文明史,在人类主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地区,原始宗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与自然和农业带来的稳定的定居生活,以及充足食物供应导致的人口增加有关,因而也进一步产生了更为庞大的人类群体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就像美国学者拉尔夫等人阐述的:“由游荡无定的群体向村落乃至城市之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功能上由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乃至从事以稳定的食物供应为先决条件的各种活动的进步。”在这些扩大了群体中,对偶家庭逐渐成形,人们开始可以确定自己的生身父亲,父系氏族社会登上历史舞台。根据亲缘关系在该社会内的重要性不同,产生了“对自己祖先宗教式的信仰和膜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语),即祖先崇拜。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旺森曾经对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作过深入探讨,他强调:“祖先崇拜是与扩大家庭占重要地位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种社会往往以定居农业作为基础。”

周代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祖先崇拜在宗教体系中占据重要角色,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以高祖配天的祖配礼最早成为

国家祭祀活动。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祖先配祭活动,都带有证明其继统合理性的意图,对东汉国家的现实政治也有积极作用。在这种祭祀祖先的拜陵谒庙活动中,对于朝拜者和随从的服饰都有详细的规定,以显示郑重和严肃,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记:“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不难看出,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拜陵谒庙仪礼,都是不敢有丝毫疏忽的,唯恐因一点失礼而影响了社稷。

作为朝拜者来说,不仅服装要讲究礼仪,即显示身份等级和礼仪轻重程度,而且所乘的车子及其装束,都要有专门规定。如《后汉书·舆服志》中以车盖的颜色与装饰物来标示主人的等级。皇室之车多用翠羽黄里的羽盖,即外面饰以翠绿色的鸟羽,里面用黄色的绸缙,故又称“黄屋车”。《后汉书·舆服志》还对官吏及士大夫阶层的用车有更为详尽的规定,如:“王,青盖;千石及以上,黑缙盖;三百石及以上,黑布盖;两百石,白布盖。”所有的礼仪活动,都要遵守严格的舆服制度,更何况拜陵谒庙。

6 《舆服志》所反映的搜狩遣将

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武装力量的调动和军事行动的决策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皇帝就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如何通过服饰表示对军事行动的重视,在历代《舆服志》中有明确的表述,如武弁的穿戴(图7)。《明史·舆服志》中记载:“皇帝武弁服:明初亲征遣将服之。



图7: 中国古代戎装

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云：‘《会典》纪亲征、类禘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备。’璁对：‘《周礼》有韦弁，谓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国朝视古损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当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纱冒之，武弁当以绛纱冒之。’随具图以进。帝报曰：‘览图有鞞形，但无系处。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则圆。朕惟上锐取其轻利，当如古制。又衣裳鞞舄皆赤色，何谓？且佩绶俱无，于祭用之，可乎？’璁对：‘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带，以前系鞬，后系绶。韦弁之鞞，正系于革带耳。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帝复报璁：‘冠服、衣裳、鞞舄俱如古制，增革带、佩绶及圭。’乃定制，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鞞，俱赤色。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鞞，俱上系于革带。舄如裳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刻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从统治阶层的视角如何看待运用武力的重要性，武力活动的重要程度和鲜明特征，都可以从武弁的形制(如皮弁)和色彩(纯用赤)上体现出来。其上还辅以“讨罪安民”的文字强化军事行动的正义性质。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古代武将的服饰形象始终讲究。《旧唐书·舆服志》是这样记载的：“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长寿三年四月，敕赐岳牧金字、银字铭袍。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师(狮)子，左右卫饰以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豹，左右鹰扬卫饰以鹰，左右玉铃卫饰以对鹞，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人们一直认为，武则天此举直接导致了明清两代官服上补子的盛行。

后世与武则天朝有所不同的是，明清武官补子均为兽，文官则为禽。而武则天时除了麒麟、狮、虎、豹之外还有猛禽，如鹰、鹞等。与此

同时，武官享受“甲冑不拜”的特殊待遇，《舆服志》中多次显示出中国历代宫廷对武力的倚重。

7 《舆服志》所强调的藉田亲蚕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粮食和副食的生产具有战略价值，而以桑养蚕则是中国人有代表性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独享的衣服面料——丝绸的主要来源。几千年来，农桑一直支撑着历代王朝的财政运行。因此，皇权如何体现自身对两者的重视，就需要一些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还要有与之相配的一定服饰。《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注写道：“《史记》曰：汉文帝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应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亩，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应劭《风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郑玄注：‘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终之。’”

《晋书》中也记载了皇权对藉田亲蚕的重视，并如何制定相应的礼仪和服饰：“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缺。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

在中国古礼中，每年三月，王后要出面主持祭蚕桑礼，以祷告桑事丰收。在《周礼·天官·内司服》中，专写有“鞠衣”(图8)。汉郑玄



图8:鞠衣

注：“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像桑叶始生。”《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写道：“是月也，天子乃荐鞠于先帝。”汉高诱注：“《内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后汉书·舆服志》专门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都有蚕服，青上缥下，深衣制……直至《唐六典》中，说到皇后必备的仪仗服饰，第二类就是鞠衣，用于“亲蚕则服之”。明代时改为红色，前后织金之龙纹，绣或铺翠圈金，并饰以珠。明代以后，正规的宫廷亲蚕制度才消失。

在中国民间，始终流传着一个美妙的传说，那就是蚕桑的发明者叫“先蚕”，原本是黄帝元妃嫫祖。古籍中说她“始教民育蚕”。蚕乡的女性，直至今日仍保留着祭先蚕的仪式。中国《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中记载着一个“马头娘”的故事，也说到蚕的起源。如今东南亚一些国家将马头娘塑成神像，供奉在庙中，这也说明中国农桑经济对邻近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其实，研究《舆服志》的收获还不止以上七点。例如，笔者发现《舆服志》在各代史书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汉书》中始有“志”类，《后汉书》设有《舆服志》，但是仅有上下两卷。从《晋书·舆

服志》显现出一种规模；《旧唐书·舆服志》篇幅不大，于是《新唐书·车服志》实际上予以补充。《宋史·舆服志》记载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是最多最全面，以致长达六卷。到《明史·舆服志》时，车旗服御作为统治制度的形象表现形式，已被封建王朝高度认识到。通过千余年的封建政权运行，这种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一种有力的范式，后人修史的经验也已丰富，这一点从规模和内容上都可以看出来。

《舆服志》之所以存在，尽管有些断断续续，毕竟至金代已成定制，金以后的史书中一律设置。这足以说明，中国封建王朝确定政治制度时，意识到强调政治秩序就必须有礼仪形式，而礼仪形式又必须依据外显形象和整体规模，这就是中国封建政权所需要的车马仪仗。

再如，历代《舆服志》开篇即追溯到黄帝，即使统治者是少数民族的朝代也依然如此。圣人之说较为常见，孔子的“殷辂”和“周冕”为之定调，“五经四书”成为理论依据。再如，秦制舆服被普遍认可，这是一些共性。个性更是显而易见，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收稿日期：2015年4月9日）